

为何要保护“不古老”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本报驻京记者 彭丹

“1992年7月1日，济南老火车站钟楼上精确的机械钟永远停止了转动，伴随济南人走过80个春秋的老火车站就此尘封。”在2014年举行的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谈到济南老火车站被拆，依然痛心疾首。

这座火车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的一座典型的德式车站建筑，它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是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的建筑类教科书上的范例，被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到远东最值得看的第一站”。就在拆除之前，无数济南市民扶老携幼涌到站前，与其合影留念。

提起中国的建筑遗产，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雕梁绣柱、兽脊琉璃的古建筑。20世纪建筑遗产由于时间较近，较少得到人们的认同和保护。在“旧城改造”和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历史街区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变成瓦砾，不少类似济南火车站的建筑遗产或被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成立于这一背景，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从此有了专家团队。截至目前，该委员会共向社会公布了7批697个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覆盖了除青海省以外的全国所有省市区，其中年代最久远的建筑包括1900年代所建的上海佘山天文台（1900年）、浙江图书馆孤山馆舍（1903年）等，最新的建筑则属20世纪最后一年即2000年规划、2007年底建成的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

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指导下，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历时近五年，组织30多位建筑文博设计界专家学者及高校教师编撰了《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以下简称《导读》），日前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该书不仅展示中国20世纪经典建筑项目特色、历史文化背景，也揭示中国20世纪建筑师的创作人生，更为中国从世界遗产数量大国步入世界遗产“文化强国”补全遗产类型、赢得建筑遗产话语权等方面探寻路径。

以该书为切口，我们追溯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脉络，打捞那些淹没在历史深处的人与故事。

以建筑回望百年历史风云

“20世纪建筑遗产”，顾名思义是根据时间阶段进行划分的建筑遗产集合。“20世纪”是很明确的硬指标，“遗产”却涉及如何界定的问题。

“说到‘遗产’，大家首先想到它是古老的，《世界遗产名录》其实早已更新了‘遗产’观念，不再单纯以时间作为衡量‘遗产’的尺度。”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会长、《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主编金磊介绍，20世纪遗产的概念最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从国外引入中国；2002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提出从“文物保护”到“文化遗产保护”的观点；2004年，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国馨代表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向国际建协提交了“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的清单”（当时只提交了20项）；2008年4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主题为“20世纪遗产保护”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进一步明确了20世纪遗产的重要历史地位。遗憾的是，20世纪遗产尚未被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有多少楼台隐现其间？它们仿佛城市的年轻与血脉，凝结着一个世纪的挣扎与进取。



▲《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书封。
▶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的北京火车站。
▼上海外滩建筑群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那些鲜活的历史故事依然投射在建筑的幢幢楼影中——

南通大生纱厂、无锡保兴面粉厂等一批工业遗产追溯着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育史；

有“东方华尔街”之称的天津解放北路近代建筑群，讲述着天津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发展历程；

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外滩建筑群见证了中西文化的交融激荡和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

在长期遭受西方国家严密封锁和遏制的背景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北京“国庆十大工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建成竣工，成为中外建筑史上的奇迹……

这些建筑不光锚定着一个城市的记忆，许多仍是用于生产、生活的物质空间，就像一条通达古今、流淌不息的河，没有了它们，城市也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与灵性。

但在大众心中，20世纪刚刚过去，很少会将这一时期的建筑视作“遗产”。“以建筑为例，过去提及的中外建筑遗产大量是古代建筑，中国已拥有56项世界遗产，是世界遗产数量大国，其中的建筑类遗产绝大多数是历史悠久的古代建筑。”金磊说，就在勒·柯布西耶、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等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经典作品早已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20世纪遗产中，并没有中国建筑的身影。

优秀建筑的考量标准，不应该苛于建成年代。“20世纪遗产”的概念普及这些建筑会有重合。”金磊说，在用更为现代的“遗产观”为公认的文保建筑加持的同时，委员会更鼓励那些籍籍无名，甚至连历史建筑也不是、从未被人发现过的“老房子”被推介成为20世纪建筑遗产，换句话说，要让20世纪遗产的保护理念进一步“向基层沉底”。

金磊犹记得，2017年8月，中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组织的专家团队正在安徽考察，一行人凑巧走进了位于安徽池州的国润茶业祁门红茶老茶厂，被里面的建筑现状所“惊呆了”：这座看似不起眼的老厂房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叫“贵池茶厂”，这里的老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建厂之初由工人们自行建造的木质连装生产线还在运转不停。

池州当地人习惯称之为“老茶厂”，提起它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年轻的时候在那里揀过茶。”揀茶车间呼呼作响的风扇是那个年代人们共同的记忆，傍晚时分，从池口老街到青峰岭、跃进路，一路上喧闹拥挤的全是茶厂下班的女工。

“殷天雾厂长陪我们走进一个搁茶叶的仓库，整座仓库的5个立面全是

木头的！”金磊回忆当时的细节：当仓房门打开，红茶的香气袭来，仓库因防火之需不允许通电，过了大约几十秒，大伙儿才借由窗外透来的微弱光线，看到暗红色墙壁边堆着一袋袋茶叶，长达70余年的茶分子运动让茶的香气弥漫了整座仓库，许多来此参观的人为“这个房子的味道所倾倒”，甚至有开发商出重金要将整座厂房买走，股厂长坚决不卖。

进一步挖掘“老茶厂”的历史，专家们发现它所生产的祁门红茶正是法国作家亚历山大·仲马创作的小说《茶花女》中所喝的红茶；这款茶被英国白金汉宫及欧洲各国所推崇，被誉为“镶着金边的女王”。基于这一悠久的茶文化和建筑自身的时代特点，原本毫无名气的国润茶业祁门红茶老茶厂被推介为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与它并列的有同为工业遗产且鼎鼎大名的北京首钢老厂区。随着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活动把目光投向除北上广等大城市以外更广阔辽阔的城乡，更多鲜为人知的建筑将“浮出历史地表”。

为中国建筑师立传留史

正如《导读》一书中写道，“中国20世纪建筑史的百年史诗是由作品筑就的，但只有建筑师不拘囿于一隅的多风格创作，才有建筑百花园的大千气象。”20世纪初将西方现代建筑思想带回本土并结合中国元素付诸实践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作品毫不逊色于外国同行，但他们有太多人籍籍无名。诸多中外建筑师、建筑商、工程师、城市规划师和其他建筑从业人员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工作和影响，直到近些年才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筑业中国》一书里总结，在中国的建筑活动历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近代此起彼伏的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技术引入下，跟建筑相关的工作愈发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质。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华洋杂处、新旧交织之间，流传下来的传统工匠营造系统，无力承担更为广泛和快速的建筑营造，大量新型建筑在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城市拔地而起，而当时能够驾驭这种发展趋势的，几乎只有国外建筑师和事务所——直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打破了这一垄断。

这些建筑师中最杰出的代表，如范文熙、吕彦直、杨廷宝、梁思成、刘敦桢、童童、陈植、董大酉等都历经五四洗礼，且多是留学归来，那时正值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建筑业发展

的蓬勃时期，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建筑师们提供了展露才华的时代舞台。在保持固有文化内涵的同时，中国应该如何从建筑和技术的双重维度，去借鉴西方既有之经验？第一代建筑师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担着入山以启山林、在荒野中开拓新路一样探索民族形式与现代风格兼容的建筑创作，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建筑学科与建筑职业体系，以及用现代知识体系来梳理中国古老的营造传统。他们留下的建筑遗产与设计思想也交织进国家发展的时代命运里。

例如梁思成与林徽因归国后，在东北大学短暂执教后前往北平营造学社主持法式部的工作，完成了大量至今仍影响深远的历史建筑调研，以及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性工作，为中国建筑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童童自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对江南园林进行大量调查和研究，提升了社会对这门中国传统艺术的关注；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既保持了传统建筑风格，也做了一系列大胆突破，成为用现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建造中国民族形式建筑的第一人；杨廷宝设计了京秦铁路辽宁总站（现在的沈阳北站）、清华大学生物馆、气象台及图书馆扩建工程等，“是用设计作品探索中国古典建筑、民间建筑与西方科技最新理念相结合的大家”……

遗憾的是，中国20世纪建筑教育鲜少将个人写入历史，这些建筑大家和他们宝贵的设计遗产思想大多湮没无闻。“历史宛如一部挑剔的机器，它会随着时间的风雨变迁和大浪淘沙，将一些建筑师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属于20世纪遗产一部分的建筑师的名字不该被淹没，他们饱经风霜的作品，更要熠熠生辉，成为中国城市不可缺少的真正标志建筑。”金磊建议，第一，建筑与文博界要为中国百年著名建筑师留史；第二，国家要为中国建筑师先贤树碑立传；第三，行业学会要积极为百年来中国建筑师的现当代影响力做好传播规划；第四，要举办展览展示、研讨沙龙、考察重访为一体的文旅活动；第五，要创办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文献博物馆，同时向中外建筑文博界及社会展示中国建筑巨匠的20世纪与现代贡献。

盼旧建筑“活化利用获新生”

就在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试图挖掘20世纪建筑遗产的独特意义之时，不少这一时期的建筑实物遗存却面临拆毁之虞。由于缺少完善的法律保障，不少20世纪建筑遗产在城市广场建设、城市道路拓宽和“旧城改造”中被拆毁，再加之20世纪建筑

相对老化速度较快、材料性能寿命较短，较之传统建筑面临更大的保护与修缮的技术难题，其抢救工作日趋紧迫。前文所提到的被拆除的济南老火车站便是令人唏嘘的例子。

在单霁翔看来，20世纪作为社会变迁最为剧烈的文明时期，各种重要的历史变革和科学发展成果，都折射在20世纪建筑遗产上，这一体现文明发展的序列不应在当代发生断裂。那些沐浴在真实的空气、阳光、绿荫环境中，饱含历史信息、岁月包浆的城市、街道和建筑也承载着民众的记忆与乡愁，正如马国馨院士所说，“人文城市的建设重在对其特色的挖掘和保护，而非简单的开发、建设和‘造城运动’”。

然而，城市宛如不断生长的有机体，一直处于发展壮大、新陈代谢之中。如何让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回应城市改造更新的需要？如何寻找保护历史记忆与挖掘使用功能的平衡点？金磊认为，关键在于建筑遗产的“活化利用”，让旧载体“诞生”新功能，融入到市民公共活动和城市文化建设的中去。

上海的四行仓库改造便是影响深刻的建筑遗产改造案例。1937年10月27日至30日，四行仓库保卫战举世瞩目。时任国民革命军第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孤军顽强死守，抵御日军数次进攻，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这座原本平凡的近代仓库承载了上海悲壮的抗战记忆。

2014年，上海有关方面决定在第二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纪念日之前完成四行仓库的保护和再设计，这一重任经方案竞标落到了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师、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资深总建筑师唐玉恩及其团队身上。为真实恢复四行仓库保卫战中鏖战最激烈、受损最严重的西墙，建筑师们几番探查炮弹洞口，经过修复，西墙如今共保留了8个炮弹孔、430个子弹孔，复原成1937年战后受损的历史原貌。

四行仓库在战后成为库房，上世纪80年代后曾用作家具城、文化用品市场等空间载体，其间，外立面经历多次统一粉刷，厚度50至60毫米，中央廊道被层层封堵，西墙西侧搭建了多层厂房……秉持国内各项规定和国际通行的真实性、整体性、可识别性、可逆性等文物修复原则，这一抗战遗址被合理化区隔，设置抗战纪念馆、创意办公等功能空间，并增设消防设施、现代化设备等，以提高使用的舒适性，既能凸显抗战遗址的重要意义，也能科学合理地利用其余部分。最终，这座“抗战丰碑”在苏州河畔获得了“新生”。如今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这里，了解远逝的战争岁月，缅怀保家卫国的抗战勇士。

随着各大城市在规划建设提升中对历史街区和老建筑的保护程度，不少类似四行仓库的建筑遗产得到了活化利用，但这样的“幸运儿”仍是少数。由于对现代优秀建筑的价值认知还未形成一套系统、科学、完善的评估体系，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未被纳入保护范畴，不当更新的风险仍旧存在。正如马国馨院士所言，“建筑遗产的保护绝不是单纯少数专家学者或政府管理部门的事情，在整个漫长的保护过程中还十分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或许关于20世纪建筑遗产漂浮零散的印象转化为用文字、图像、影像等来讲说的坚固公众记忆，一座城市的精灵，才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



▲南通大生纱厂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图为大生纱厂钟楼。